

千秋古港刺桐城—— 香港應以泉州為殷鑑

福建泉州於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廿六至廿九日舉行了“中國泉州市舶司設置九百周年學術討論會”。所謂“市舶司”，類近現代之海關，係古代海外貿易的管理機構。泉州乃古代海外交通與貿易的重要港口，其市舶司設置於北宋元祐二年（1087）十月初六，伊今已九百年。唯此番在該市舉行有關的紀念活動，純屬對歷史古跡之巡禮，蓋此座古稱“刺桐城”之著名海港，早已無復昔日之光輝，令人不禁有“城郭猶是，人民已非”之慨！

儘管如此，仍有一百多名海內外學者參加是次學術討論會，提交了七十多篇論文。筆者也有幸能赴此同仁盛會，重新領略刺桐古城之風采。

為甚麼海內外學者仍對泉州懷有如此濃烈的興趣，不遠千里風塵僕僕地趕到這東南海濱，齊集一堂高談闊論呢？為甚麼香港學者也如此重視加強同泉州方面的學術交流與合作呢？這自然是因為泉州曾經是中世紀最大的港口，而且它在歷史上之盛衰也頗發人深省。不過此一問題卻非三言兩語即可交代清楚。目下香港恰好是近代以來世界最著名之自由港，其某些特點正同歷史上的泉州相似。作為香港人，知一點古代泉州海外交通與貿易之盛衰史，對於明瞭自身現今之處境與際遇，是大有裨益的。有鑑於此，筆者願費些筆墨將古城泉州稍作敘介，庶可鑑古知今。

歷史悠久的文化古城

泉州位於福建省東南部，枕山面海，風光綺麗，素有“山川之美為東南之最”的佳評。其歷史可追溯到數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彼時已有原始人類於此繁衍生息。周代泉州一帶屬七閩之地，有古越族聚

居，稱為閩越。迨唐代景雲二年(711)，改武榮州為泉州，不過直到開元六年(718)，其州治始遷至今泉州市地。

泉州城跨晉江下游兩岸。相傳晉室衣冠南渡時，避居此地者多沿江而居，故稱流經此處之江為晉江，爾後晉江又成為泉州所在之縣名。自古迄今，晉江兩岸青山連綿，田園似錦，而一個中古世界名港即誕生在這般山明水秀之地。

此外，泉州尚有許多古色古香的別名。唐、五代間因環城遍植刺桐樹，故稱刺桐城。或謂中世紀外國人遊記中的Zaitun即刺桐的對音，唯筆者則認為或係晉江二字之訛轉。蓋千百年來泉州、晉江二名實密不可分，亦頗難斷分，外國人到泉州很可能被告知晉江一名，遂轉成Zaitun。歷史上詩人吟誦刺桐古城之詩詞，可謂絡繹不絕，如唐王叡云“南國清和煙雨辰，刺桐夾道花開新”，宋呂造謂“閩海雲霞繞刺桐，往年城郭為誰封？”由於氣候溫潤適宜，泉州亦稱溫陵。更兼由清源山俯瞰全城，其形似鯉魚，遂有鯉城之雅號。據《福建通志》載，“泉州繞城皆植刺桐，號桐城，又曰溫陵城”，“刺桐城，節度使留從效重加版築，傍植刺桐，歲久繁密”。由此可見，泉州之歷史確實悠長久遠，自作為州郡治所，迄今至少已歷一千餘載。

海灣優良的天然港口

泉州固然以歷史悠久而為人們所注目，然其在古代海外交通史上所佔之地位，尤其令人津津樂道。猶如彩虹錦帶般的晉江穿過泉州，世世代代哺養了泉州人民，亦孕育了泉州古代輝煌之文化。晉江的入海處就是泉州古港了，至今這裏仍是舟帆點點，風光明媚如昔。

由於泉州瀕臨浩瀚無際之東海，海岸線蜿蜒曲折，有深邃的水道與天然的良港，故自南北朝起，該地在海外交通方面就已嶄露頭角。據傳在六世紀時，已有印度高僧飄海東來，譯經於泉州的九日山下，是為早期中外交流的一段佳話。

到了唐代，泉州成為福建全省之出口門戶，故《泉南雜志》曰“唐設泉州……參軍事四人，掌出使導贊”。唐文宗曾下詔云“其嶺南、福建及揚州蕃客，宜委節度觀察使常加存問。除舶腳、收市、進奉外，任其來往通流，自為交易，不得重加率稅”。唐室對海外貿易之大力提倡，遂使泉州海外交通迅速發展，成為和廣州、交州（在今越南河內一帶）、明州（今浙江寧波）並列的全國四大海外交通名港之一。

宋代香瓷之路的起點

作為中古世界大港，泉州的此種地位乃於宋代方始奠立。宋人謝履《泉南歌》有云，“泉州人稠山谷瘠，雖欲就耕無地闢。州南有海浩無窮，每歲造舟通異域”。《宋史·杜純傳》也提到“泉有蕃舶之饒，雜貨山積”。此等記載無疑係宋代泉州海外交通盛況之真實寫照。

隨著泉州在海外貿易方面地位之日趨重要，北宋王朝遂決定於此設立市舶司。關於此事，《宋史》諸書並無詳載，唯《宋會要》及宋人王應麟之《玉海》均繫於元祐二年十月初六。《宋會要》載，“哲宗元祐二年十月六日，詔泉州增置市舶”。不過當時似未專設提舉，仍由轉運判官兼領。至崇寧間（1102-1106）始置提舉官，旋廢，大觀元年（1107）復置。市舶司之設置，表明泉州已和廣州、明州並駕齊驅，成為北宋對外貿易之三大港口。

及至南渡之後，宋室更銳意經營海外貿易。時在中外交通方面，海路已居於主位。學界或有將海外交通之道路謂之曰“海上絲綢之路”，然此名雖頗具浪漫色彩卻未盡貼切，蓋作為“沙漠之舟”的駱駝比較適於運載絲綢、布帛，而真正的舟舶卻可裝運陶瓷等形狀、大小不同之貨物。宋時，由海外入口之貨物以香藥為大宗，而出口海舶據宋人朱彥《萍洲可談》記其“貨多陶器，大小相套，無少隙地”。準此以觀，當時之海外交通途徑，莫若稱為“香瓷之路”或“絲瓷之路”。

泉州在南宋時由於接近首都臨安（今浙江杭州），便自然而然地成

了當時海外交通的“香瓷之路”的起點。據宋人吳自牧《夢梁錄》載，“若欲船泛外國買賣，則是泉州便可出洋”，“若有出洋，即從泉州港口至岱嶼門，便可放洋過海，泛往外國也”。宋太宗的八世孫趙汝适更一度出而提舉泉州市舶，並撰下《諸蕃志》一書，廣記泉州與外國交通貿易之盛況。據計宋代泉州與三十多個國家、地區，均有貿易往來關係。船舶所至，北抵高麗、日本，南達麻逸（在今菲律賓）、爪哇，西到大食諸國（在今阿拉伯），其範圍之廣袤蔚為壯觀矣。

絢麗多姿的古跡文物

泉州之作為宋代香瓷之路的起點，不但見諸歷史文獻記載，更有眾多的古跡文物可資佐證。值得指出，泉州發現和保存的海外交通文物之多，在全國沿海諸市中幾乎無與倫比。倘若我們對泉州作一番大致的巡禮，即不難發現許多文物古跡均與兩宋有關。諸如泉州的四大名橋，即筍江橋、順濟橋、洛陽橋和安平橋，都建於宋代。洛陽橋在泉州東郊和惠安之間，係北宋蔡襄所督造，其所撰並書的《萬安橋記》仍立於橋南街尾的蔡襄祠中。安平橋在晉江安海鎮，俗稱五里橋，因橋長五里故名，是為中古時代世界最長的樑式石橋，向有“天下無橋長此橋”的美譽。六勝塔、姑嫂塔等古代泉州港口的重要航標，亦均建於宋代。六勝塔又稱石湖塔，座落在晉江縣石湖村的金釵山上，始建於北宋政和間。姑嫂塔或稱關鎖塔、萬壽寶塔，建於南宋，它位於晉江石獅鎮的寶蓋山上，《讀史方輿紀要》稱該塔“宏壯突兀，出於雲表，商舶以為抵岸之標”。

提到泉州的海外交通與古跡文物，不啻及開元寺與清真寺幾無可能。開元寺雖始建於唐，然其增修卻在五代、宋以後。該寺不但有佛教的雕像與殿堂，而且有古埃及神話、印度婆羅門教神話的雕刻，乃至古希臘哥林多式的石柱，故一向被目為中外交通之明證。今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就設在該寺之東側。開元寺雖出名，而寺內之東西雙塔尤為遠近皆知。它們由唐代的木塔變為磚塔，再轉成宋代之石

塔，猶如一對孿生姐妹不斷更換時裝，代代永葆青春。法國人談及巴黎鐵塔往往如數家珍，唯其係近代機械之產物；而泉州東西塔卻建於七八百年前，通體均由花崗石構成，其建築之宏偉、精密、典雅，實令人歎為觀止。

隨著唐宋時期中外交通之發展，阿拉伯回教商人遂紛至沓來，而泉州自然成了他們的麇集之所。矗立在泉州塗門街的清淨寺，就是一個重要的見證。該寺原有二碑，其一為漢文碑石，謂清淨寺始建於紹興元年（1131）。另一碑為阿拉伯文，云此寺名聖友寺（或作艾蘇哈卜寺），乃該地第一座禮拜寺，建於回曆四百年（約當西曆1009-1010，北宋大中祥符二年）。目前學界多主張此寺應依阿拉伯文碑石所云，復稱為聖友寺或艾蘇哈卜寺。至清淨寺原址在城南，因寺已毀其碑石被移植於聖友寺。聖友寺係中國現存最早的回教禮拜寺之一，寺的拱門、殿堂亦全都用青色或白色的花崗岩石築造，建築技術巧奪天工。

此外，泉州東郊靈山半坡上又有回教之聖墓，相傳係穆罕默德弟子三賢、四賢之陵墓，此說雖有待考證，然至少反映唐宋回教商人在泉州影響之廣大。聖墓四圍古木參天，怪石嶙峋。其中有一天然巨石，上可坐十餘人，風吹石動，然始終不墮，俗稱“風動石”，此亦泉州之一大勝景矣。宋代蕃商大多住在泉州城南瀕晉江之處，其中有印度人、波斯人及阿拉伯人等等。宋人林之奇曾專撰《泉州東坂葬蕃商記》，載及蕃客在泉州墓葬諸情事。

遠洋航行之重要見證

泉州之海外交通文物古跡，實在比比皆是，舉不勝舉。除上述之外，在泉州西郊的九日山上，存在著歷年航海季節祈風的摩崖刻石。因當時人們已知道利用季風（又稱信風）以航海，故宋代泉州知府王十朋詩云“北風航海南風回”。儘管如此，每逢揚帆出海或返航季節，泉州郡守與市舶司官員例必邀請舶商，集於九日山之延福寺通遠祠，舉行祈天求風儀式，並勒石紀事。現存石刻共七十四處，宋代刻

石四十八，其最著者一十三。

另泉州南門天后路，在南宋時曾建有聖妃宮（後又稱天后宮），乃紀念海神天后即莆田湄州女子林默娘（又叫媽祖）的。史書上曾稱她為“福建海神”或“泉州海神”，今已成為東南亞沿海居民普遍祭祀、家喻戶曉的航海女神。

至於宋代海船之出土，更是泉州海外交通史上之一大盛事。宋代由泉州發舶遠航的中國船，稱為“泉舶”或“香舶”。南宋曾於泉州城南門外專門設廠，製作遠航巨舶。據載，宋元泉州極盛時曾統有海舶一萬五千餘艘。1974年，在泉州後渚港出土了一艘宋末（一說為元初）的木船，內載乳香、龍涎香等各種香藥四千七百多斤，是為香瓷之路極為重要的考古文物發現，進一步證明泉州不愧是香瓷之路的起點。現在已專門修建了“泉州灣古船陳列館”，作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的陳列專題之一。

中古世界之貿易大港

如果說泉州在南宋之際還和廣州、明州並稱為全國三大對外貿易港口，那麼到了宋末元初，泉州已扶搖直上，凌駕於廣、明二州，成為中國的第一大港。更有進者，泉州在元代更成了世界最大的一個貿易港口。元人吳澄曾記曰，“泉，七閩之都會也。番貨遠物異寶奇玩之所淵藪，殊方別域富商巨賈之所窟宅，號為天下最”。泉州的回教富商蒲壽庚家族，在宋元之際曾壟斷了蕃舶之利，富貴冠於一時。據載，元泉州的回教禮拜寺有六七所之多，充分反映回教商人在泉勢力之龐大。元代史弼等之出征爪哇，也是從泉州後渚港啟行的，足見泉州乃有元一代海外交通之主要門戶。

從元代外國人的中國遊記來看，泉州港的國際地位更是昭然若揭。如《馬可孛羅行紀》將泉州稱為刺桐（Zaitun），謂“所有印度船舶運載的香料及其他貴重貨物，咸集宏大繁華的刺桐城。……余敢斷

言，如有一艘船運胡椒到亞歷山大港 (Alexandria) 以供應基督教諸國，則同時必有百艘船運來刺桐港。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港口之一，這裏貨物堆積如山，幾乎難以想像”。《伊本·巴圖塔遊記》則提到，“刺桐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我目睹港內有大舶百艘，小船多得不可勝數”。這些記載均為作者親身經歷，他們都曾周遊世界而有所比較，應非虛詞妄語。

孛羅與鄭和到過泉州

在中外交通史上，有許多出類拔萃的偉人。其中意大利人馬可孛羅和中國的鄭和，已以他們的光輝事跡而成為舉世聞名的傳奇人物，而他們恰恰都先後到過泉州。

馬可孛羅不僅到過泉州，其實他離開中國返回意大利，就是從著名的刺桐城發舶升航的。無怪乎他在《馬可孛羅行紀》中盛讚了刺桐城，使泉州得以名噪全球。馬可孛羅同意大利人鄂多立克、摩洛哥人伊本·巴圖塔被譽稱為元代西方三大旅行家，而這三個人全都到過刺桐城，並均在其遊記中保留了有關泉州的珍貴實錄。此外，元代的天主教方濟各會修士安德烈·佩魯賈等三人，也曾至泉州播教並設立天主教堂，被稱為“泉州三主教”。

到了明初，泉州在海外交通方面，仍保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偉大航海家鄭和第五次下西洋時，在出發前曾於永樂十五年 (1417) 五月，在泉州回教先賢塚行香，並刻石為記。“鄭和行香碑”就樹立在回教聖墓迴廊右側，碑文記云：“欽差總兵太監鄭和前往西洋忽魯謨斯等國公幹，永樂十五年來此行香，望聖靈庇祐。鎮撫蒲和日記立”。這也是泉州海外交通史上值得一書之盛事。

明代以後，泉州作為對外港口之作用日益式微，但她在中國海外交通史上卻佔有一席光輝的地位。特別是大量歷史文物的不斷發現，使泉州海外交通史之研究顯得愈益重要而迫切。

撫今追昔，我們對泉州這座中古世界最大的港口，應該給予充分的重視。僅以宗教而論，泉州之歷史價值即不容低估。古來曾有人稱泉州為“泉南佛國”。誠然，泉州保存有相當多的佛教古跡與文物，例如開元、承天、崇福諸寺。原來泉州東門仁風街的少林寺，更被視為中國南派少林拳的發祥地。但是除佛教之外，幾乎中國流行過的各種宗教，都可在泉州找到一些遺跡。且不說泉州洋宮內的孔廟，也不提道教的太上老君岩、真武廟、城隍廟、天后宮、花橋宮等等，僅回教禮拜寺在元代就有六、七所之多，全國各地恐無出其右者。

此外，泉州華表山草庵有現存最早的摩尼教（即明教）寺址。在開元寺內，混合有佛教、婆羅門教乃至埃及古代宗教之遺跡。再加上元明在泉州發現的十字架碑，以及後來的天主教、基督教堂，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泉州本身就是一座世界宗教之博物館。

古港盛衰與香島沉浮

通過以上所述，我們既為泉州海外交通史之充實豐富而讚歎不已，同時亦為明代以後泉州之衰落而深感惋惜。泉州之由盛入衰，是個複雜的問題，其原由係多方因素所構成。諸如外港海灣之日益淤塞，廈門港之開發並逐漸取泉州而代之，全國首都之北遷，等等。然明、清朝廷之“海禁”、“閉關”政策應亦極其重要之根源。蓋千百年來，泉州、晉江一帶之居民多恃海外貿易為生，一旦遇到海禁，自是民窮財盡、城敗港衰。此等歷史教訓實值深思。

寫到這裏，一種將泉州與香港進行比較之念頭，不禁油然而生。蓋兩地之間確有相似之特點。其實，香港古代對海外交通的歷史較之泉州並不稍遲。《新唐書·地理志》在記載賈耽的“廣州通海夷道”時，一開始就提及“廣州東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門山，乃帆風西行……”，足見屯門一帶在唐代不啻為廣州之外港。及至宋代，周去非在《嶺外代答》提及由海外來華時，更明確地指出：“其欲至廣者，

入自屯門。欲至泉州者，入自甲子門”。此處所記不唯表明屯門一帶的重要性，更將其與泉州相提並論，實在饒有興味。

爾今吾港更被譽為“東方之珠”，係世界最著名的自由港之一。她在國際金融、貿易、交通諸方面固有其重要性，至於文化方面則尤因東西交匯融合而頗具特色。同樣以宗教為例，在香港不僅有道教、佛教、回教，而且有基督教的天主教、新教、摩門教諸教派，更有印度教、錫克教、猶太教等等，比起古代泉州來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然而綜觀歷史，一國一族或一港一島，其盛極而衰、衰透復興之例證，比比皆是。以宋元香瓷之路的兩端，即泉州與大食而言，當時海外貿易均盛極一時。後來泉州海運廢退，阿拉伯各國也一度藉藉無名，爾今西亞回教勢力於世界政治舞台上與經濟命脈中均日益見得舉足輕重。唯當年回教商人麇集之泉州，仍然有待於開放政策中再度興盛。

中古世界之第一大港泉州，既然會由盛入衰，今日世界之名港香港，也不一定永遠保持繁榮興旺。香港將來會不會由絢爛轉於沉寂？此中既有世界各國互相競爭、力量消長的因素，也有不以港人意志為轉移之客觀條件的作用。更有繫於管治香港當局所制定的政策及其實施的後果。我們當然不希望香港這艘自由的寶船沉沒。然而社會的興亡，不比作戰場上的得失，兩軍對壘，勝負並不完全由於軍力不逮，更有賴於軍心與士氣。楚漢相爭，項羽敗於“四面楚歌”；淝水之戰，苻秦失於“草木皆兵”、“風聲鶴唳”。可見人心背向、信心足缺猶為成事之關鍵。香港會否重蹈泉州之覆轍呢？這便要看港人與當局今後如何經營了。

（與江潤祥先生聯名，發表於《明報月刊》1988年3月號）